

刘国光 戴润晨 等著

不宽松的现实 和宽松的实现

双重体制下的 宏观经济管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宽松的现实 和宽松的实现

——双重体制下的
宏观经济管理

刘国光 戴园晨
田江海 沈立人
张燕生 张德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国平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
——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

刘国光 戴园晨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31.5 插页 1 字数 784,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

ISBN7-203-01124-9/F·209

定价 18.80元

前 言

近些年来，宏观经济管理越来越成为经济理论界注视和研究的热点，专著和文章甚多，其势正方兴未艾。一些学者在这些年来的讨论中，曾先后发表过一些论著；由于强调宏观经济管理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宽松环境，他们被称为“宽松学派”。如今面对百舸争流的理论热潮，我和田江海、沈立人、张燕生、戴国展等同志耗费两年精力，把有关的观点条理化和系统化，成此专著，以参与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本书定名为《不宽松的现实和宽松的实现——双重体制下的宏观经济管理》，是针对我国当前双重体制并存的特定阶段进行理论探索的。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基本状况，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仿，被称为“短缺经济”，即需求过旺而供给不足，经济运行很不宽松。10年改革，新体制方生，旧体制未死，经济机制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宽松的现实。有的同志认为，这是不可扭转的。果真如此，岂非成了不治之症？我们一些同志认为，不宽松主要来自体制的缺陷和政策的偏差，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因此，只要坚持改革，端正政策，就有可能逐步清除短缺，实现相对的宽松，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当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关系到整个管理体制、发展战略和各项具体政策的转变和组合。本书的目的，就是在这些方面提供一些思路和设想，希望在千虑中能贡献愚者之一得。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理论联系实际，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在本书的讨论和写作中，我们力求做到从实际

出发，探索实践中提出的各项问题。我们认为西方的宏观经济学是需要借鉴的，但并未象某些著作那样套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体系，因为我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规则有自己的特点，套用未必适合我国的实际，也未必有益于我国的读者。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一书是经过高度抽象的对于传统经济体制的描述，对于双重体制下的经济运行却不完全适用；而且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只诊脉不处方”，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很不解渴，何况该书忽视政策研究，而在政策手段的运用中也存在着机制和规则。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总框框，但是具体的运行机制或模式，还有着大量的不同层次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去探索和创造。正是本着这些理解，本书做了许多费力而未必成功的探索。全书总的说来属于平凡的献曝之言，但我们确是认认真真去做、去思考的，因而也就无愧地把这些探索中的想法贡献给读者。

本书是由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课题的三个成果之一。其他两项是：《体制变革中的经济稳定增长》（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和《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三本书，都围绕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有相同或相近的对象，但又各有自己的角度和观点，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虽然其中某些理论观点不尽相同甚至差异颇大，但是也有相互补充、参照之处，都是直接、间接地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寻觅道路。

本书共22章，在统一规划下，分别由刘国光（第一章）、戴国展（第二、五、七、八、九、十三、十四、十五、十八章）、田江海（第四、六、十、十一、十二章）、沈立人（第三、十六、十七章）和张燕生（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章）执笔。全书最后由戴国展统稿。附录由张德霖整理。在写作过程中，宣统渊等同志帮助搜集资料、核实数据、誊写稿件等，在此表示感谢。

刘国光 1990年7月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情势的重述和探索的回顾	1
第二节 产生短缺和供需失衡的原因	12
第三节 争取宽松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目标设计	22
第四节 走向稳定的政策选择	33

上篇 体制篇 ——不宽松的现实

第二章 有效需求过旺的体制根源	48
第一节 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蕴含的内在 机制的表现	48
第二节 有效需求过旺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蕴含的内在机制 的表现	67
第三节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约束需求过旺的种种议论	80
第三章 双重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89
第一节 分级管理的必要和改革向地方分权倾斜	90
第二节 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101
第三节 “诸侯经济”的形成加剧了短缺	109
第四节 “诸侯经济”导致短缺的体制分析	117
第四章 企业向独立经济实体前进中的困惑与徘徊	125
第一节 企业地位的三重性与目标的多元性	125
第二节 企业改革的发展过程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136

第三节	“抽肥补瘦”和软预算约束	146
第四节	“抽肥补瘦”从低效益和高需求两个方面造成了 短缺	153
第五章	个人收入扩张的愿望与实现形式	163
第一节	打破“铁饭碗”与觉醒了的个人利益	164
第二节	双重体制下收入分配的二元特征	171
第三节	工资侵蚀利润使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	186
第四节	个人可支配收入膨胀	194
第六章	总需求膨胀下的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	197
第一节	双重体制下的有效供给不足	197
第二节	双重体制下的结构失衡	216
第七章	双重体制下不宽松的现实——短缺和通货膨胀的 并存与互换	234
第一节	陷入了收放循环的“怪圈”	235
第二节	导致总供需失衡的因素(上)——体制因素和政策 因素的理论争论	243
第三节	导致总供需失衡的因素(下)——自然因素不容 忽略	248
第四节	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反而加剧了总量失衡 和短缺	257
第五节	改革的协调	266

中篇 政策目标篇

——适度增长和稳定增长目标

第八章	政策目标的选择和配组	281
第一节	体制和政策的关系——体制中的不稳定因素能通 过政策克服吗?	281
第二节	政策目标多元化以及各项政策目标之间的矛盾	291

第三节	政策目标的合理配组和政策手段的协调运用	300
第九章	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率和“供给略大于需求”的反周期 对策	313
第一节	选择经济增长率的历史经验	313
第二节	适度经济增长率的选择	322
第三节	“供给略大于需求”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反周期 对策	332
第四节	投资利用效率曲线反映的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 ..	339
第五节	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提高投资利用效率	352
第十章	投资需求的目标选择	359
第一节	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	359
第二节	投资扩张与供需均衡	376
第三节	适度投资率的确定	385
第十一章	消费需求的目标选择	410
第一节	消费需求刚性	410
第二节	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	416
第三节	个人可支配收入膨胀下的消费早熟	429
第四节	适度消费率的确定	445
第十二章	总供需缺口和通货膨胀	467
第一节	总供需缺口的测定	467
第二节	储蓄的个人动产性质及计算总供需缺口时的对 待	479
第三节	总供需缺口——货币过量供给——通货膨胀	486
第四节	控制通货膨胀与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501

下篇 政策手段篇

——宽松的实现

第十三章	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521
-------------	----------------------------------	------------

第一节	从通过指令性计划进行直接调控转向利用政策手段进行间接调控	521
第二节	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的局限性	531
第三节	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539
第四节	连接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桥”	550
第十四章	财政政策	562
第一节	“稳定器”和“加速器”的选择	563
第二节	“小财政”和“大政府”的矛盾	571
第三节	国家财政支出和用财之道	578
第四节	年度平衡和周期平衡	584
第五节	编制复式预算和利用债务调节	590
第十五章	税收手段	595
第一节	税制结构和主体税种选择	595
第二节	税收课征强度与总量调节	606
第三节	税收对供给结构 and 需求结构的调节——税负的转变和归宿	617
第四节	冲击“诸侯经济”的分税制设想	630
第十六章	货币金融政策	638
第一节	货币金融政策的重要性	638
第二节	对货币流通量的调节是货币政策的核心	648
第三节	防止信用膨胀和搞活资金融通	659
第四节	货币金融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	670
第十七章	利率手段	680
第一节	利息和利率概述	680
第二节	利率和储蓄	689
第三节	利率和投资	698
第四节	利息和利率手段的运用	707
第十八章	收入分配政策	718

第一节	收入分配政策及总量调控	718
第二节	利用劳动工资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	722
第三节	收入分配调节体系的建立	738
第十九章	有效的供给管理政策及模式选择	749
第一节	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短期稳定和长期稳定	749
第二节	供给、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	756
第三节	供给增长与结构性存量调整	766
第二十章	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结构调整	772
第一节	产业结构存量调整与供给增长	772
第二节	劳动力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开发	806
第三节	供给管理的政策选择	828
第二十一章	对外开放中的国际贸易政策	836
第一节	对外开放与长期经济发展	836
第二节	对外开放中的经济不稳定增长	845
第三节	贸易战略的选择	860
第四节	贸易刺激机制与贸易政策	872
第二十二章	对外开放中的国际收支政策	881
第一节	国际收支状况分析	881
第二节	对外开放中的汇率政策	891
第三节	对外开放中的外汇储备管理政策	910
第四节	对外开放中的外债管理政策	917
附录	我国需求和供给平衡与宏观调节理论的发展	925

第一章 绪 论

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事业中，走过了40年的光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近10年多的改革，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又掀开了新的一页。但是，无论前30年或近10年，在积聚丰富经验的过程中，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历尽了曲折和艰辛。正象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40年来，我国经济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也有失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往往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因此，必须牢固地树立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本来已经提出多年，“但是并没有真正为全党同志共同接受和认真贯彻执行”。现在作为党的决定，则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突破性进展。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界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紧迫任务。这本论著，就是在几年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基础上，着眼于90年代，进一步总结、思考和探索的结果。本章的内容是对全书的综述，概括地表明我们的基本思路，特别是突出某些多少含有新意的看法和想法，希望得到关注此一问题的同志的指正。

第一节 情势的重述和探索的回顾

我国40年来，尤其是改革10多年来的成就，国内外的文献都有翔实的纪录和生动的描述，这些毋需再作系统的论证。对于80年代的进展，不妨归纳为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建设。80年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77万亿元,超过前30年的总和。其中,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投资1.08万亿元,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有1000多个;投入更新改造资金5470亿元,完成技术改造项目40.9万项。与1949年相比,煤、电、钢铁、纺织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增长以十几倍、几十倍计。同时,还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如汽车、飞机、电子和石油化工等,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在农业上,兴修水利,整治耕地,发展了农业机械化和乡镇企业,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铁路、公路、水运、空运能力和邮电通讯等设施能力也有了迅速的增长。

二是在大规模建设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从国民经济恢复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953年算起,到199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社会总产值为8.7%,农业总产值为3.6%,工业总产值为11.7%;1990年同1980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2.3倍,平均每年增长12.6%,农业总产值增长84.6%,平均每年增长6.3%。粮食、棉花和原煤、原油、电力、钢铁、机床、水泥以及纱、布和某些家用电器的产量都有不同倍数的大幅度增长,不少产品产量先后跃居世界各国同类产品产量的前列。

三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尤其是近10年,人民得到的实惠较多。1990年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达到1387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30元,剔除物价因素,分别比1980年增长68.1%和123.9%。全国绝大多数居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过渡。

重述这些人们熟悉的数字,肯定了我们40年来的经济情势是不断向上的,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真理。我们不仅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是如此,并且进行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但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忽视前进中的问题。

总体上看，建国以来的40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1949—1978年），经济是发展的，而动荡比较激烈；后10年（1979—1988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但也不是没有起伏。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提出周期性波动的问题，说法不尽一样。一般认为，这种波动周期是5年左右一次，先后出现过8次：第一次是1953—1957年，第二次是1958—1962年，周期各为5年；第三次是1963—1968年，周期为6年；第四次是1969—1972年，第五次是1973—1976年，周期各为4年；第六次是1977—1981年，第七次是1982—1986年，周期各为5年，第八次是1986年以后，周期也在五六年之间，可能到1991年后渐趋正常。

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有人认为是难免的，不同经济制度的各国都无例外。但是，我们必须加以区别。一种波动确实难免，有如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影响农业生产，由于重大工程的兴建和投产而影响增长速度，由于科学技术的突破而加快发展步伐，由于国际市场的旺衰而导致产销畅滞等。历史资料表明，这种波动幅度有限。另一种波动，其幅度比上述大得多，也不是由于上述原因所产生，则不能认为是必然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波动，其幅度比别国大得多。据计算，1953—1985年我国的波动系数（每年的增长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的差距）超过22个百分点，比美国高4.7倍，比日本高2.7倍，比联邦德国高3.4倍，比法国和英国高5.1倍，比苏联高4倍。其中，1958—1962年达66.5个百分点。^①并且周而复始，始终未得有效纠正。这就值得认真研究了。

这样的经济波动，也不象有人所说，有利于高速增长，或者是高速增长的客观规律即所谓“不平衡——平衡——不平衡”或“高速度——低速度——高速度”的规律。相反，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带

① 参见程秀生等：《对我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的初步研究》，《经济研究》1990年第2期。

来了严重的后果。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和至今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或消极面,都与这种增长的大起大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

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首先,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速度和效益本来是统一的,但在经济增长不稳定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有矛盾。它表现在:当追求高速增长时,往往只图产出,不计投入,以牺牲效益为代价;当速度被迫下降时,往往效益率先“滑坡”。几次三番的大起大落,使资源利用效率也随之起伏,甚至越来越低。例如我国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1952年为71元,“一五”时期平均为32元,“二五”时期平均只1元,“三五”、“四五”“五五”时期分别为26元、16元和24元,“六五”时期为41元。另如以产值、资金、成本、工资为基数的各种利润率和投资产出率,几乎都未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

其次,不利于优化产业结构。稳定增长和比例协调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不仅使总量失衡,并且使结构失调。无论是过去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或近年来的“轻工业六个优先”,都使产业结构过度倾斜,进而成为制约稳定增长的障碍。我国第一、二、三次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为29%、48%和23%,1987年为29%、46%和25%,变化甚微;而在工、农业之间及其内部,尤其是基础产业和加工行业,相互脱节越来越明显;至于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等,同样存在无序现象。

再次,不利于实现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应当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但在一味求快的扩张冲动下,容易侧重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以基本建设排斥和替代更新改造,甚至蓄衍增长较快的低技术,使整个技术结构难以逐步升级。同时,在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统治下,使产品不愁销路,也无助于推动新产品的开发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最后,不利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相反,却会欲速不达或得而复失。每个波动周期都有其高峰和低谷。在高峰期,曾经出现过年增长率达到15%甚至超过20%的“奇迹”,令人兴奋不已,但是

无法持久,随即“滑坡”,有时竟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两者相抵,平均增长率一般仅为高峰期的一半或更低,与原来的期望值相差很大。在一起一伏之间,损失严重,导致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改善程度与名义上的经济增长率不相称。

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除了非经济因素外,根本的问题是:

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迟迟未得及时的转换。我们在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时,限于当时的种种条件,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只能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沿袭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特征,是以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为主要目标,以增加投入即提高积累率为主要手段,以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这在工业化初期,本来无可厚非,而且确实取得了积极效应。但是同时,逐步暴露了某些矛盾,例如追求速度而不顾效益,偏好工业而忽视农业,过多积累而抑制消费,等等。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先后转向采取所谓变通的或新的发展战略。我们不是没有觉察,但是对其惯性估计不足,特别是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总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是高速度(而不是高效率),制定经济发展计划以产值为中心。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进一步凝成了以产值增长速度高低作为评价标准的成绩机制并诱发攀比机制,更是积重难返。经久不衰的“产值热”,成为导致周期性大起大落不可抗拒的盲动力。

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也迟迟未得及时的转换。一定的经济管理体制服从于和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也由于缺乏经验,我们起初只能大体上仿效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套,沿袭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这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对于集中力量发展重点部门,同样是有利的。但是,在经济发展到相当水平后,其弊端则不断暴露,特别是变为两个“大锅饭”,导致“投资饥饿症”和“消费饥饿症”,从部门、地方到企业都热衷于扩张冲动,缺乏自

我约束的机制。需要指出的是：经过近几年的初步改革，“投资饥饿症”没有治愈，“消费饥饿症”却从隐性转为显性。这种双重膨胀，来自改革处于双重体制并存阶段的某种错位即微观有所放活而宏观则更失控。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粘性与传统经济发展战略的惯性相结合，造成长期以来的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在总量上的失衡和结构上的失调，突出地表现为“短缺”。经济环境经常是紧张的，无论在大起阶段或大落阶段，除非化很大力气，才有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宽松。

这些经济现象及其剖析和溯源，大家并不是没有认识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的浪费和损失。”陈云也说过：“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①“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②根据这些精神，我们多年来探索过此一问题，现在略作回顾如下：

最初，在进入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开始提出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新的用语并着手研究这个新的课题时，我们认为：“中国过去的发展战略几经变化，有比较正确的时候，也有重大失误的时候。当战略决策正确时，国民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以改善，社会主

① 《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② 《加强和改进经济计划工作》。《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页。

义制度得以巩固；而当战略决策失误时，经济发展就受挫折，人民生活不能改善，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受到削弱。”^① 回顾过去，我们肯定，“建国30年来，中国在经济的发展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的重工业基础，基本上解决了10亿人民的温饱问题等等”；同时，并不否认发生过一些挫折和偏差，“这种偏差，主要是经济建设上要求过急，……表现为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和投资规模，超出了国力的可能，结果不得不收缩，一进一退，损失很大，耽误了时间。”^② 总结经验教训，对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提出以下几点：(1)“在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上，从过去常常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意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2)“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的问题上，从过去的片面追求高速度转变为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中心任务”；(3)“在处理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关系上，从过去的片面突出重点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转变为抓重点、促平衡的发展战略”；(4)“在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上，从过去的一味依靠上新的建设项目的扩展方式转变为更多地注意通过企业的整顿、改组和技术改造来挖掘现有企业潜力的内含发展方式”；(5)“在物力和人力两种资源的开发上，从过去的只重视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转变为开发物力资源和开发人力资源并重的战略”；(6)“在对待内外关系的问题上，从过去的实际上的闭关自守转变为自力更生为主并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7)“适应于上述几个转变，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从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经济形式和过分集中的、排斥市场机制的、吃大锅饭的体制转变为坚持以国营经济为主的多种经济形式、经营方式并存，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新体

① 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页。

② 同上书，第21—22页。